



闽都文化研究会 编

闽都文化

与台湾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海峡文艺出版社

HaiXia WenYi Publishing House



闽都文化研究会 编

闽都文化与台湾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 HAIKOU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闽都文化与台湾/闽都文化研究会编.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550-0396-0

I. 闽… II. ①闽… III. ①文化史—福建省—文集②文化史—台湾省—文集 IV. ①K295.7—53
②K295.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4902 号

闽都文化与台湾

闽都文化研究会 编

责任编辑 谢 曦

编辑助理 吴瑶华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

厂 址 福州金山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10 千字

印 张 22.75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396-0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闽都文化与台湾》编委会

主 任 练知轩

副主任 高 翔 王聪深 汪征鲁 赵麟斌

编 委 卢美松 林 山 陈章汉 王华南

黄文山 薛 菁 邹自振 卢翠琬



目 录

王元稚：亲历台湾近代化进程的福州船政学人	汪毅夫 (1)
台湾近代化始于马尾船政	
——沈葆楨肇始的福建船政、保台建台伟业 140 周年纪念	游德馨 (6)
福州与台湾史前文化历史渊源初探	
——兼及南岛语族的起源问题	汪征鲁 (14)
侯官萨氏源流及其在台湾后裔	王吉林 (25)
沈葆楨与台湾的关系	
——台湾近代化的奠基者	骆芬美 (31)
晚唐五代福州政权的兴衰过程与河洛文化的历史意义	桂齐逊 (48)
闽都名人对台湾发展的贡献	
——以船政为例	刘焕云 (58)
闽都文化对台湾社会发展的影响	赵君尧 (73)
晚清时期福建人士对台开发贡献之研究	
——以沈葆楨为例	王远嘉 (85)
从传教士书信谈康熙时期的台湾风貌	
——兼述台闽交流	侯皓之 (100)
明代福州与台湾的关系	
——以海防体制的设置为核心	连启元 (112)
“买棹初从福地游”	
——台湾士子对福州的科场情结	卢美松 (128)
闽都文化与台湾儒学的发展	赵麟斌 (134)
晚清福州与台北的城市化建设	徐晓望 (142)
闽学与清领时期台湾儒学之关联性	吴进安 (153)



试论闽都书院与清代台湾社会的发展	徐心希 (166)
清代榕台两地儒学教育渊源探略	薛 菁 (190)
福建武英殿聚珍版之承传	吴瑞秀 (202)
闽台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工作制度初探	吴炆和 (214)
架构海峡民俗文化立交桥	林 山 (221)
榕台翰墨 源远流长	
——概述海峡两岸书画发展与交流之轨迹	梁桂元 (229)
台湾传承与宋代福州	
——以临水夫人信仰及相关传统工艺为中心	韩桂华 (245)
创意庙会文化与闽都地方城市发展的共生理论	蔡泰山 (256)
闽都陶艺与苗栗客家陶艺之发展	陈俊光 (275)
福州饮食之流传台湾	郭伯伦 吴淑卿 (287)
闽都武术文化的生态选择：与台湾共建平台	李忠京 王华南 (310)
台湾陈靖姑造型艺术与意涵	熊品华 (321)
《曲判记》的移植与改编	
——从闽剧到歌仔戏的符码转换	洪琼芳 (334)
徽班、福州徽班与台湾正音戏	
——本地人对正音戏接受的两种面向	黄思超 (353)

王元稚：亲历台湾近代化进程的福州船政学人

汪毅夫

王元稚，字少樵，号无暇逸斋主人，福建闽县人。著作有《致用书院文集》、《致用书院续存》、《秉铎公牍存稿》、《读赵注随笔》、《汉儒赵注从祀始末记》、《文庙图像笺校》、《说文学四种》、《说算》、《算学四种》、《读左随笔》、《读五代史随笔》、《作嫁·借箸集》、《作嫁·借箸集续集》、《酬应杂存》、《楹联杂存》等。

我藏有王元稚之子王祖毅等8人“衔哀谨述”的《哀启》。

兹据此一民间文件推知王元稚生平的情况如下。

1. 生年与卒年。《哀启》有“宣统辛亥，先严七秩古稀”和“民国辛酉，先严八秩揽揆之辰”之语，“宣统辛亥”和“民国辛酉”分别为1911年和1921年，照此则王元稚生年当为1842年；《哀启》有“丙辰归自杭州，家居未久，青年会聘讲授国文，举藏书数万卷捐赠图书馆以公同好。时省立经学会亦聘任经学讲授。不孝等以先严年高颐养宜辞退为请……仅许辞青年会之聘而专任经学会教员，在会十年”和“竟未臻于百龄”等句，“丙辰”为1916年，照此则王元稚卒年为1926年，享年八十有四。

2. 功名和官职。《哀启》记“年十九与闽县童子试，受知于长沙徐寿衡学使，入邑庠，食廪饩”，“以一诸生膺重任”，“入乡试者十九科，光绪乙丑恩科……抑置副车”。“光绪乙巳恩科”（1905）为“太后七旬恩科”，“副车”即“副榜举人”，据此可知，王元稚在1860年至1905年的功名为“诸生”即秀才，1905年以后始得称为“副贡”。1993年6月版《重修台湾省通志》卷八第一册《职官志》记王元稚在凤山县学教谕、台湾府学训导、台湾府学教授任上的功名为“光绪副贡”，乃是一种追记的写法。《哀启》记“光绪初元船工告成，先严以劳绩得保县丞……愿改就教职，先后任凤山县学教谕，台北府学教授，在台垂三

十年”。查张作兴主编《船政文化研究——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① 船政大臣沈葆楨有《船工告成，积年出力员绅请奖折》为“所有船政积年出力人员”请奖。据《哀启》记，“同治六年，吾闽兴办船政，时沈文肃公任船政大臣，先严以试文受知，乃上书陈时务。文肃公一见激赏，即檄召为船政前后学监督，在事五年，夙夜奉公，堂规整肃，以一诸生膺重任，先严感遇奋发，生平愉适，无过此时”，王元稚属于“船政积年出力人员”，他在“光绪纪元”得“保县丞”时已经离开船政在台游幕，改就教职任凤山县学教谕则是光绪七年（1881）的事了。王元稚在台湾担任的最高官职是“府学教授”，在品级上属于正七品。但是，王元稚应该得到了五品封赠，因为《哀启》称其夫人严氏为“严宜人”，宜人是五品官员妻室的封赠。

3. 受业及受知。据《哀启》所记，王元稚先后受业于“侯官沈秋舫太夫子”、“郑虞臣、林颖叔、谢枚如诸生”；又受知于徐寿蘅、沈葆楨、丁日昌、岑春煊、陈玉苍、沈爱苍、郭啸麓等当道诸公。

另据民国《武平县志》，^② 王元稚曾任武平县学教谕。

4. 船政办差和京师讲学。《哀启》记：“清同治六年，吾闽兴办船政。时沈文肃公任船政大臣。先严以试文受知。乃上书陈时务，文肃公一见激赏及檄召为前、后学监督。在事五年，夙夜奉公，堂规整肃。以一诸生膺重任，先严感遇奋发，生平愉适无过此时。”这一段简历，可同王元稚的一段自述相参证：“（同治五年）冬，左爵帅（宗棠）创船政局，招考生童，余报名应试，原考首列，复试黜落。题为《车战议》，余方读《日知录》，知车战之原委，言之特详。王荔丹（宣辰）孝廉得阅余卷，亟称于沈文肃公（葆楨）。六年……六月，文肃公服阙接船政印，召余入学堂延见，甚加奖借。考学堂诸生童，题为《为才须学也》，余取冠军，奖洋银十元。中用噬脐语，余偶依《左传》，脐作齐，文肃公掷之，终疑焉。王肖曾明经以‘不错’对，文肃公乃命学堂监督传谕：自认误掷。河海之量，不可及也。给假乡试，又馈洋银十元，支三个月贍银十二两。……文肃公曾受业于秋舫师，明年召师入船政，时师已接骆氏馆聘。文肃公顾曰：‘何不推荐王某？’余闻之感极涕零，发愤上书近三千言，痛陈学堂利弊。（同治六年）十二月奉文肃公札，入学堂监督，月薪二十两。七年戊辰，二十岁，正月初三到船政

^① 张作兴主编：《船政文化研究——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104页。

^② 《武平县志》，福建武平县志编纂委员会，1986年12月整理本，上册，第264页。

差所，奉差管理前学堂”。^①

《哀启》记：“生平喜办学务，培育后进。罢官后历充京师大学堂、顺天高等学堂、闽学堂、杭州第一中学、宗文中学、女子师范学校、广东随宦学堂、监狱学堂、国文修身专科教员。”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前身；顺天高等学堂为河北师范大学前身；闽学堂则是清末福建旅京人士的子弟学校，这是王元稚京师讲学的三所学堂。

附带言之，查郝平《京师大学堂创办史考源》^②附录《京师大学堂教职员名单》，未见王元稚之名。王元稚在京师大学堂担任的也许是临时性或辅助性的教职。

现在据我闻见所及讲述王元稚“在台垂三十年”的若干情况。

王元稚在台经历，恰同台湾近代化的进程（1874—1895）相始终。

据《哀启》所记，王元稚从同治七年（1868）起在福建船政任事5年。5年后，船政提调夏献纶于同治十二年（1873）二月赴台湾履署理台湾兵备道任。王元稚当于同年或次年台入于夏献纶幕。夏献纶在船政提调任上曾“阅枪炮书，特奖银六两”给翻译“枪炮书”的船政翻译处（时王元稚在该处当差），又曾就带队出洋留学事“询元稚”。^③

王元稚到台湾初时，台湾的近代化进程起步伊始。

陈孔立《台湾历史纲要》^④谓：“台湾的近代化从1874年沈葆楨到台就开始了……经过近20年的经营，台湾出现了全国最早自办的电报业和新式邮政，全国最早投产的新式大煤矿，全省出现了第一条铁路、第一台电话、第一枚邮票、第一盏电灯、第一所新式学校，出现了自己经营并敢于与外人竞争的轮船，出现了有数以千计现代工人的矿区，也出现了最初的民族资本。许多新式事业集于一省，成效蔚然可观，使边疆海岛新建的行省，后来居上，称为全国洋务运动中的先进省份。”

1874年发生的日本侵台事件激发了清政府加强台湾防务和台湾建设的决心，也推动了台湾近代化的脚步。

日本侵台事件发生时，王元稚在台湾道夏献纶幕中，得以将事件相关文件辑

① 林萱治：《福州马尾港图志》，福建地图出版社，1984年版，第41—42页。

② 查郝平：《京师大学堂创办史考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 林萱治：《福州马尾港图志》，福建地图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页。

④ 陈孔立：《台湾历史纲要》，九州图书出版社，1996年版。

录成书，以《甲戌公牍钞存》刊行。是书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是王元稚在台的一大贡献。

据《清实录》，光绪元年（1875）六月十三日有谕：“沈葆楨已谕令来台陛见，所有台湾开山抚番事宜，著王凯泰督率夏献纶等实心办理。沈葆楨著俟与王凯泰妥筹具奏后再行内渡，将船政事宜妥为交代，即日启程北上。福建内地并台湾所属各县及各番社，著详细绘图呈览，并著将各种番族形状另行详绘成帙，一一呈进。”

遵照此一谕旨，夏献纶主持绘制《台湾舆图》。据杨永智《明清时期台南出版史》，^①《台湾舆图》又名《台湾舆图并说》，该书由王元稚撰写，夏献纶作序并说明乃由“闽县王广文元稚纂校”。王元稚可能还参与了夏献纶主持的《日本窥台抚番纪略》一书的编写，惜是书未见。

光绪七年（1881），王元稚出任凤山县学教谕；光绪十年（1884），王元稚任台湾府学训导；光绪十四年（1888），王元稚再任台湾府学训导；光绪十八年（1892），王元稚任苗栗县学教谕；光绪十九年（1893），王元稚任台湾府学教授。

王元稚在台湾，还曾在台湾道刘璈幕中为幕友。从刘璈《巡台退思录》看，同夏献纶一样，刘璈亦是推动台湾近代化颇力的干员。

另据《哀启》所记，王元稚在闽曾受知于沈葆楨、丁日昌，在台期间亦当对沈、丁两公推动台湾近代化有所助益也。

1895年，日本据台。台湾近代化的进程终止。王元稚于是年四月十二日离台内渡，又于1896年十二月再渡台湾，“在台北谦益行攻算学代数术，晨夕弗辍，竟能通之”。

近20年前，我在《从俗谚俚语看台湾历史社会的若干情况》^②里解说台湾民谚“无福不成衙”，略谓：

关于“无福不成衙”，吴瀛涛《台湾谚语》^③谓：“清代，台湾的官吏多数是福州人，此因福州是福建省的省垣，而当时闽、台管辖未分离，所有台湾的州厅县官，大部分是由福建总督、巡抚、从省内拣选，自然上至抚台衙门的幕僚，下至县丞衙门的杂员都充斥了福州人。”这里有一个误解。清代

① 杨永智：《明清时期台南出版史》，台湾学生书局，2007年版。

② 收拙著《台湾社会与文化》，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③ 吴瀛涛：《台湾谚语》，台湾英文出版社，1979年版。

回避制度规定，“督抚以下，杂职以上，均各回避本省”。本省人不得在本省担任文职官员（武职和教职稍可放宽）。清代台湾的官吏虽然多是由闽省督抚“于闽省内地官员内拣选贤能之员”派任，但“闽省内地官员（文职官员）”并无福建本省人，所谓清代台湾“上至抚台衙门的幕僚，下至县丞衙门的杂员都充斥了福州人”是不准确的说法。“无福不成衙”的真正含意是：清代台湾各衙门多有福州人充任幕友、出任教职。幕友不等同于幕僚（衙门内有官职的佐助人员），是衙门内分管刑名、钱谷和文案事务的没有官职的佐助人员（俗称师爷），由各级衙门长官私人聘任。清代台湾各级文职官员多选自“闽省内地”，聘请“闽省内地”人士（尤其是福州人士）到台充任幕友也渐演为一种风气。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曾聘任福州举人陈石遗为幕友，陈石遗在台期间（1886年9月—1887年12月）为刘铭传“掌记室”，承担文案事务（撰写“章奏书札”等）。台湾末任巡抚唐景崧的幕友中也有福州人士方雨亭、周松荪、郭宾石、王贡南、郑星帆、林仲良等。另一方面，台湾的各级教职（教授、学正、教谕以及训导）也常有福州人士出任。如福州著名诗人刘家谋（1815—1853）曾任台湾府学训导，周莘仲（1884—1893）曾任彰化县学教谕等。在台湾充任幕友和担任教职的福州人士广泛介入了清代台湾各个时期、各级、各项行政事务，“无福不成衙”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

王元稚正是以幕友和教职的身份“在台垂三十年”，并亲历台湾近代化进程（1874—1895）的福州船政学人。

〔作者简介〕汪毅夫，台盟中央副主席、全国台联会长。



台湾近代化始于马尾船政

——沈葆楨肇始的福建船政、保台建台伟业 140 周年纪念

游德馨

沈葆楨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洋务派的代表。他与左宗棠、丁日昌等船政一班人，在保卫台湾、建设台湾方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沈葆楨，福建侯官人（今福州市），1820 年生，清道光举人、进士。清同治五年（1866）六月，闽浙总督左宗棠上疏，建议创办福建船政、自造机器轮船、自办学堂培养造船、驾驶人才。不久，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他“三顾茅庐”，力荐沈葆楨。经同治皇帝钦点，沈葆楨出任总理船政大臣。按照左宗棠的计划在马尾中歧踏勘选址，征购土地，建设工厂、船坞、学堂、宿舍，聘用洋员洋匠，采购机器，船政建设全面展开。创办船政是一新鲜事物，遭到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对，要求清廷下令停办；也引起外国侵略势力的忌妒，暗中挑拨洋人雇员之间的关系，使之相互对立。沈葆楨与左宗棠力排众议一起上疏批驳，并革除造谣生事的洋总监工，使船政建设得以继续进行。

从 1866 年至 1875 年，沈葆楨总理福建船政 9 年，工作兢兢业业。他坚持“权操诸我”的理念，在待遇上对洋人优惠，在管理上严格要求，坚持国格。先后开除违反协约规定的洋工 20 多人，使他们知所敬畏，不敢飞扬跋扈。他放下架子，深入工厂车间，向外国员工请教，逐渐由外行变成内行。福建船政很快成为当时远东最大、世界第三大船厂，下设 13 个分厂。至 1907 年制造大小舰船 40 艘，其中在沈葆楨任上建造 16 艘，船政学堂培养学生 629 人。其中严复、罗丰禄、陈季同、魏瀚、萨镇冰等学生尖子，还遣派出国留学，成为我国近代国家建设栋梁之材。

一、福建船政的倡导者——林则徐

船政的建立，不能不提及我国民族英雄林则徐。他与船政虽然相距 20 多年之久，但他为船政的建立做好了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鸦片战争时期，两广总督林则徐在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认识到没有坚船利器，不足以抵抗海上强

敌。他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是说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以对付侵略者。林则徐又说：“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这个思想 20 年后被左宗棠、沈葆楨所继承，在建设福建船政时加以发扬。左宗棠是晚清主张坚决抵抗外侮的爱国主义者，比林则徐小 27 岁，崇拜林则徐的功业与为人。尽管他当时只是一个三赴会试不中，身无半职的举人，却是林则徐心目中一个心忧天下的有志青年。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上就赏识左宗棠的才学。辞官东返福州途中，经过长沙，特约左宗棠在湘江船上会晤，彻夜纵谈时务，后人誉为“湘江夜谈”。林则徐对他寄予殷切期望，曾多次向朝廷奏荐重用，直至临终口述遗嘱由其子林聪彝执笔，写奏折推荐左宗棠这位奇才，左宗棠的名字因此引起朝廷重视。左宗棠立志要继承林则徐未竟事业，以实际行动“师夷，制造坚船利炮以制夷”。沈葆楨是林则徐的外甥，12 岁就跟随舅父，练习书法，得到林则徐的言传身教与严格要求。林则徐认为他年虽幼小，知书达理，资质极佳。20 岁中举人后，即将二女儿林普晴许配与他，林则徐是沈葆楨的舅父兼岳父。正是林则徐培养的左宗棠、沈葆楨二人，秉承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遗志创办福建船政。应当肯定，林则徐是福建船政的启蒙人和引导者。

二、沈葆楨抵御日军，保卫台湾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后起之秀、国力渐强，走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1871 年开始吞并琉球，1874 年借口“牡丹社”事件派兵入侵台湾；1894 年甲午海战，清政府大败，签订了“马关条约”，夺去了我国领土台湾；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窃取了德国在我国青岛的权益；1931 年“九一八事件”夺取我东北三省；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占领我中华半壁江山，奸淫烧杀，血债如山；1941 年 12 月 7 日清晨偷袭珍珠港，炸毁美国飞机 188 架，击伤 291 架，击沉、击坏军舰 18 艘，炸死美军官兵 3600 人，发动太平洋战争。并趁势大举南进，侵略香港及东南亚，走向自取灭亡之路。

1874 年 4 月，日本在长崎设立“台湾番地事务局”，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随时准备侵台。借口琉球船民 54 人遭台湾少数民族“牡丹社”人所杀害，出兵 3600 余人，军舰 5 艘，由西乡从道带领，从台南登陆，拟侵占台湾。5 月，清政府任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他临危受命，率领中国近代第一支舰队——福建水师的 14 艘战舰（全部由福建船政自己制造，驾驶、轮机班底全部出自船政学堂）赴台。他



受命后即上奏提出御敌四策：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抵达台南安平时，立即召见当地官员，提出理谕、设防、开禁三大反侵略方针。总之他是以扩军备战，增强军事力量为后盾，准备打战。从外交入手，大做舆论，进行说理斗争。为加强海防建设，他加紧修建安平、旗后、澎湖、鸡笼（基隆）、沪尾等地炮台，安放西式巨炮。至今仍保存的“亿载金城”就是当年的安平炮台。沈葆楨还奏请从福建陆军、淮军洋枪队、粤军增兵，军力达1.2万人。其中淮军先集中到上海，由严复驾驶“建威”号军舰运到台湾。接着他乘“长胜”轮探测台东沿海港口地形和海面形势。沈葆楨并奏请将台湾盐课、关税尽数留下，充作海防之用，以补充枪支、巨炮、子弹。我方军力超过日本，致使日军不敢轻举妄动。在固民心方面，提出“官民同命、草木皆兵”，着手招募兵勇、乡勇，并奖励乡团，团结台湾民众增强抵抗力量。联外交方面，借重国际舆论，请各国公使会同讲理，判断曲直，使日本怵于公论。他派员与日军将领西乡从道交涉，发给照会，出示台湾府志，指出台湾是我国固有领土，日本出兵台湾是干涉中国内政，责其不义。通消息方面，沈葆楨主张修筑海底电线，并修折奏请清廷批准。为加强军情反馈，保障台湾与大陆之间信息畅通，沈葆楨用船政自制的四艘舰船分布在台湾、澎湖、福州、厦门四地互通情报，重要信件一日即可到达。

由于沈葆楨采取了以军事准备为后盾的积极抵御方针，战斗实力大大超过日军，又提出驱倭抚番政策，团结台湾少数民族，形成草木皆兵之势。同时迫于舆论压力和沈葆楨寸土不让的强硬态度，日本改变手法，直接由国内派人与北京清政府谈判。腐败的清朝政府，不听沈葆楨“不与理睬”的建议，签订了《北京专约》，被勒索50万两白银后，日军于1874年12月从台湾撤兵。这次保卫台湾，沈葆楨和船政功不可没。

三、台湾近代化始于马尾船政

经过抗击日军侵台事件以后，沈葆楨更进一步认识到台湾在我国国防上的重要地位。他指出：“台地向称饶沃，久为他族所垂涎，今虽外患暂平，旁人仍眈眈相视，未雨绸缪之计，正在斯时……”他认为，要改变清廷的消极治台政策，就要守卫台湾、开发台湾、建设台湾。自那以后几代船政人，为台湾近代化建设付出了极大努力，取得优异成果。

日军撤退之后，沈葆楨随即着手全面治理台湾，在处理台事善后过程中，他提出“善后即创始”，“善后难，以创始为善后则尤难”。着手台湾地区的大开发。

他实施“四开”举措。开禁：开放大陆人口向台湾迁移；开府：开设台北府，使台湾行政中心北移，与福州联系更加方便；开路：开辟几条通往台湾东部的道路，以更便捷地开化少数民族；开矿：开发以煤为主的矿业，促进台湾近代工业迅速发展。

（一）开山筑路，办学抚番

赶走日寇之后，沈葆桢没有就把部队遣回大陆，而是全部留下分片包干，分三段进入亘古以来不通人迹的大山，劈开东海岸悬崖峭壁。开通南路两段 389 里，中路段 265 里，北路段 205 里，共计筑路 859 里。以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开山筑路任务，使台湾东西部贯通，山区平原连成一体。这些工程相当艰巨，开凿断崖峭壁的苏花公路，至今令人叹为观止，它对台湾东部的开发起了决定性作用。现今台湾主要公路的走向仍然沿用当年的路坯。在修路同时，对沿途实行屯兵卫、勘林木、焚草莱、通水道、定壤则、招垦户、给牛种、立村堡、设隘碉、致工商、设官吏、建城郭、设邮驿、置廨署等 14 项措施。把开山修路与巩固国防，发展经济，建设城镇，加强管理结合起来，作为台湾近代化的先决条件。在开山筑路前后，台湾发生瘴瘟，不少战士染疾而亡，为保卫台湾、开发台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为纪念这批勇士的义举，沈葆桢将他们的尸骸收殓运回马尾亭江虎头山东北麓，建立“义塚”公墓，埋葬 135 具义士，至今保存完好，已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年是他们捐躯 140 周年，为了表彰其壮举，应当择时公祭，以昭后人，慰其在天之灵。

沈葆桢及其继任者把“抚番”重点放在教育上，废除以往的围堵之策，实行疏导之法。注重办学兴教，使之逐渐开化，进入文明社会，与汉人共同开发建设台湾。在虎头山、四重溪等 14 处兴办较大的义学。路修到哪里，供少数民族读书人学习的义塾就办到哪里，仅在南投埔里就设番塾 26 所。沈葆桢亲自编写教材《训番俚言》，供全台各地义塾使用。强调结人心、通人情。沈葆桢抚番采用 11 条措施：选土目、查番户、定番业、通语言、禁仇杀、教耕稼、修道途、给茶盐、易冠服、设番学、变风俗。船政第二任大臣丁日昌延续沈葆桢重视文教的抚番理念，拟定《抚番善后章程二十一条》，重在教化。先后创办义学 100 余所。并且选拔番童进府学，给少数民族读书人以很大鼓舞。办学抚番政策实行后，番民学习文化形成热潮，文明素质和文化素质大大提高，走出原始时代的茹毛饮血逐渐进入农耕时代。特别在废除汉番禁婚之后，高山族的物质文化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

（二）修吏治营政、设府置县

为了台湾稳定发展，沈葆楨、丁日昌等船政官员先后着手整顿台湾吏治。受林则徐“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的熏陶，沈葆楨到台后就提出“欲固险地，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先修吏治营政”。上奏《请改台地营制折》，对台湾营伍提出改革主张，采用“酌撤分汛、汰弱留强、合队合营、整军严纪”，以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丁日昌继续对旧班兵制度进行改革，重新整编，异地调防，进一步提高军队战斗力。在修吏治方面，沈葆楨初到时，台湾吏治腐败，官员多沉酣于鸦片，民风浇漓。他感叹地说：“此间去倭患易，去习染难。”下决心雷厉风行罢黜贪官污吏或失职官员，裁革陋习，严禁烟、赌、械斗之风。通过整顿，官风民风大有好转，为台湾发展创造了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丁日昌继承发展沈葆楨的思想，提出：“民心为海防根本，而吏治又为民心根本。”对贪官污吏严加惩办，革职查办了彰化、嘉义等贪腐成性的知县，对“索诈民财以填欲壑”的台湾县役林升判处死刑，招来万众聚观，感喟地方从此除一巨害，无不同声称快。文人赞誉丁日昌，称“儒林循吏今有几，丁公崛起南海涯”。

在健全台湾政治机构方面，沈葆楨奏请朝廷移驻巡抚，增设郡县，加强行政管理职能。他指出，巡抚驻台“有事可以立断”、“统属文武、统归一尊”。经朝廷批准，福建巡抚实行冬春驻台，夏秋驻省。加强了对台湾的管理，密切了闽台关系，为10年后台湾建省打下基础。府县设置方面，沈葆楨倡议增设台北府，经朝廷批准，他亲自勘察，1879年开始兴建台北府城，至1882年工程全部完成，台湾政治中心由台南迁移到台北。为纪念沈葆楨这一功绩，今日已成为全台第一大都会的台北市政府内设有沈葆楨厅，为台北奠基人永作纪念。2004年4月9日，台北市召开会议，纪念沈葆楨诞辰185周年。时任台北市市长的马英九主持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大加赞扬沈葆楨建设台湾的功绩。大会还邀请沈葆楨五世孙女、台大沈冬教授参加。由此可见海峡两岸人都纪念保台建台有功之臣。由于增设台北府，同时又设立恒春、淡水、新竹、宜兰四县和澎湖厅，使得原来一府、四县、三厅的格局，增加到二府八县四厅。至此台湾郡县管辖区域开始遍及全境，细化了行政区划，加强了管理，使政令畅通。

（三）解禁招垦、修祠聚心

沈葆楨开山筑路的目的就是为了开发台湾广阔肥沃的土地，同时感化提高少数民族的素质。从康熙开始，清政府有禁令：严禁大陆居民渡台开垦、严禁台湾

汉族居民私人番地、严禁生番与外人交往。这些封闭孤立的政策，阻碍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沈葆楨上疏力陈：“欲开山不先招垦，则路虽通而仍塞；欲招垦不先开禁，则民裹足不前。”奏请废除长达 190 年之久不准渡台的禁令，以广招徕。1875 年终于获准开禁，接着在厦门、汕头、香港等地设招垦局，招募闽粤人民免费乘船来台移垦。同时由官方供给口粮、耕牛、农具、种子，大力发展台湾农业经济，促进民族交流。使台湾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跟上时代。

清朝年间，在台湾的汉人大多数是明末郑成功从大陆带去的移民后裔。由于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了台湾，在人民的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威望，他们仍然私下祭奠。但是康熙认为郑成功以台湾为根据地反清复明，故不许在台湾为其建祠。沈葆楨敬佩郑成功“孤忠启疆”，为了团结更多的台湾人民，树立郑成功的形象有利于激励民心，增强民族凝聚力。于是由他主稿，与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福州将军联名奏请，终于获准在台南市建立“明延平郡王祠”，确立了郑成功的历史地位，达到了收复民心，振作忠义，激励民众的作用，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台湾人民对大陆的向心力。

（四）开矿兴业，修建铁路

台湾基隆煤矿是我国第一座用机器开采的新式煤矿。船政创建之初燃煤多来自英国进口，不但价格昂贵，而且受制于人、到货迟缓。台湾基隆埋存优质烟煤，明代民间就有用土法开采。英美等列强早就觊觎，妄想窃取，均被清朝廷拒绝。1873 年，船政局向基隆民窑订购煤炭，但不能完成交货。1874 年沈葆楨赴台时，就主张加快开发台湾煤矿，在给清廷的奏章中提出：“垦田之利微，不若煤矿之利巨；垦田之利缓，不若煤矿之利速。全台之利，以煤矿为基始。”又提出将基隆煤矿改为官办，用机器开采，以提高产量。获得清廷同意后，沈葆楨即着手筹办，雇请英国人全面勘察，购买机器、招聘洋匠，选定在基隆老寮坑立矿，人称“清国井”。1877 年煤矿建成，同年 8 月出煤，日产煤 30—40 吨，盛产时采煤工人约 1000 人，1879 年产煤 30045 吨，1881 年产煤 53600 吨。主要出售给马尾船政使用，部分投放市场，供应民用企业需要，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建设。至今“清国井”遗址尚存，有三口，一为通风井，一为主井，一为四方井。

沈葆楨在基隆建煤矿时，修就一条轻便铁路，直运煤炭到码头。1875 年 10 月，沈葆楨奉调任两江总督并南洋通商大臣。1877 年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拆除英人未经批准在上海兴建的吴淞铁路。船政继任者丁日昌建议将铁轨移至台湾旗